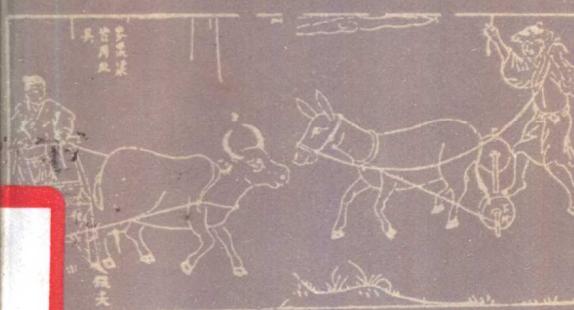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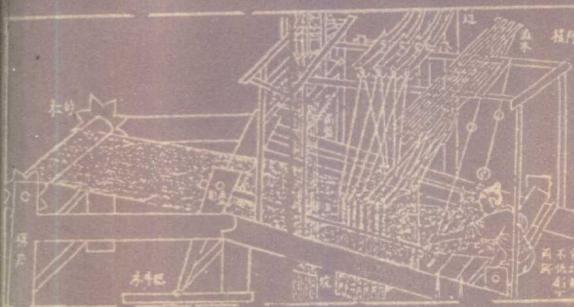


明清经济史

李龙潜 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明 清 经 济 史

李 龙 潜 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 詹家豪

明 淸 经 济 史

李龙潜 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市越秀区教育局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17.375印张420千字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5361-0074-4/F·7

定价： 4.20 元

辛勤耕耘的硕果

——序《明清经济史》

李龙潜同志新著《明清经济史》，是他多年潜心研究和经过教学实践后对明清经济的系统论述。这是一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内容翔实的好书。

五十年代，我和龙潜受业于梁方仲教授门下，研讨中国经济史。龙潜尊师好学，勤于蒐辑史料，埋头探索问题，敬业精神，很受仲师的称勉。仲师治学，素尚谨严，对受业弟子同样从严要求，包括论和史两个方面。当时仲师认真钻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尤其有关封建社会瓦解过程的典型论述，要求我们对于经济史所使用的理论范畴、概念、术语尽量弄懂它们的真正涵义，领会其精神实质，尽力避免生搬硬套的毛病。这种下苦工夫的钻研精神，同样要求我们贯穿在搜集和运用史料方面。仲师常说，要做到真正掌握史料，搜罗材料固然需要费很大的工夫，而对历史记载真伪的甄审，对历史上典章制度的考释，以及材料本身含意所允许引申的限度，都需要认真讲求。只有这样，才不致溢引论据，断章取义，或以主观臆想戴在历史实际的头上。不管理论概括和史料阐述，科学的态度都要求贯穿实事求是的精神，也就是谨严求实的学风。龙潜是受到这种学风的薰陶来著述《明清经济史》的。扎实的基本功是探索和创新的根本，也是本书一大优点。这是我读本书的第一个感受。

一部断代经济史，一部近五百年的明清经济史，复盖面广，牵涉面大，不用说，需要有广博的知识面。明清传世的史料十分

繁富，而经济史料的系统辑录和整理工作尚未认真展开，有关明清财政经济分门别类的专著尚少问世。因此，对明清社会经济作整体性的考察，进行综合论述，工作的艰巨是可以想见的了。多年来，龙潜一步一步地探索明清经济史，对农、工、贸各个经济部门和土地、赋税、盐法、矿政等制度法规，曾经广泛地作过专题研究，占有大量的史料。有了这样长期的资料积累，作过多项项目的微观研究，在这样的基础上来概述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的全貌，就比较能够做到全书体系严整，纲目分明，详略有度，举要中肯。

全书分为五章，把明初至清中叶经济的兴衰演变划分为五个段落。每一章都把政治状况与财经政策、财政状况、经济法令和农、工、商的兴衰结合起来写，例证的史实都慎重查考材料记载的历史年代才加以引用，务求论述的事状都符合当时的实际。就每个段落的横断面来说，政治和经济的交互作用，政策、制度形成和演变的历史条件，以及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同程度的变化，都有机地联系着，构成一个历史时期阶段性的特点。纵观五个段落，各个经济部门，各项经济制度又前后衔接，联成轨迹，显现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总面貌。这种分期写法，比起按专题分章来写，难度更大，需要理顺许多事实发生、发展、演变的脉络，探究各种经济现象互相影响的关系，总之，只有在把握大量史实的本末源流之后，才能把各章各节的内容妥善处理。在表述各个阶段农、工、贸的发展线索，评估它们的发展程度方面，由于史料的缺陷，对写中国古代经济史的人来说都是很伤脑筋的事。这部著作，对明代后期和清代前期的农、工、贸状况着力描述，并力图说明十六、十七世纪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由于商品经济发展而引起的新的经济因素以及旧的体制对新生事物的束缚。在这些方面，我国当代学者发表过不少专论，龙潜能博采众长，

融注于这部著作中。

严格按照历史年代顺序来叙述史实，对政治史来说较好掌握。过去的史学著作也有较多可以借鉴的经验；作为经济史来说，以什么标志作为分期的准则，我想仍可以作多方面的探索。首先，一国的政治状况、社会状况与社会经济发展趋向在历史实际中往往不是同步升降的。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是没落阶段，然而这时期的社会经济却呈现得较前活跃和带有生气，这必然使人对“没落”这一概念的领会感到模糊。其次，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其延续性，财政经济制度的演变在历史上往往经历着较长甚至曲折的过程，如何在各个阶段突出不同的重点，也很有斟酌余地。我感到，写经济通史或断代经济史，应该采取怎样的框架结构，突出什么样的主线，很值得思考。从写经济史的角度来说，怎样才能从整体性来把握一个时代，还有许多理论问题需要重新认识，需要进一步探索。

我国史学界对明清经济史的研究，近年来研讨的范围扩大了，视野开阔了，新材料的发掘增多了，研究方法也与时俱进，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我自己感到，研究经济史的路子应该越走越宽，研究经济史的重心也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前进。过去对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市场机制问题，对商品经济内在的矛盾运动，对农、工、贸的相互关系和商人资本的历史作用等，即使就微观研究来说，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努力发掘新材料固然极其重要，然而，我们按照现代的经济意识去探索古代的经济现象，寻找多项经济指标，是很难从古籍记载的表面文字中得到较满意较具体的答案的。在今天研究经济史，考释工作仍然十分重要，除此之外，很有必要借助其他社会科学一些新的研究方法。譬如说历史上某一时期的经济增长，量的观念很重要，没有具体的数量很难给人以增长程度的切实观念，也

难以切实说明性质的变化。如果能吸取社会学、人类学、计量经济学等某些方法，对某些经济现象作出近似的、多样化的推测和估算，这种尝试或许是有益的。新材料的发掘与开阔视野也有密切关系。过去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比较着重生产，很少谈论消费，至于流通和分配也只在较浅的层面来探讨。如果能够展开多侧面的研究，将会使经济史写得更丰满、更生动活泼一些，并且会产生更多、更深刻的历史启示。

古代中国，文化、科技、经济都曾取得辉煌的成就，然而进入近世，经济的发展却显得落伍了。了解和研究明清经济史，认识历史上的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的得失利弊，对我们当前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无疑是富于现实意义的。这部《明清经济史》，内容充实，提供了较完备准确的基本知识，并对许多问题提出深入细致的分析，书中注释又详列立论所引用的文献书目，既适宜作为高等学校的教材，也很适用于年青学人的自习。我和龙潜算是同行，读了这部书，自感深受教益，也就写下一些感受，其中有些属于浮想联翩的题外话，或许不免乖谬。

汤明樞

写于中山大学
1987年11月

目 录

第一章 明初社会经济制度与社会 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洪武元年至宣德十年 1368—1435)

第一节 明初农村政策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1)
一、明初国内形势和农村政策.....	(1)
二、明初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19)
第二节 明初土地制度与赋役制度.....	(24)
一、明初封建土地所有制诸形态.....	(24)
(一)官田的种类和阶级关系(24) (二)民田的种类和 佃农、自耕农的地位(43)	
二、明初的赋役制度及其特点.....	(50)
(一)赋役黄册与鱼鳞图册的制作经过、内容及其作用(51) (二)田赋的种类、科则和粮长制度(59) (三)徭役的种 类及其征发的情形(63) (四)明初赋役制度的特点(66)	
第三节 明初工商业日趋繁荣和商税、货币制度.....	(68)
一、明初手工业者地位的改善和生产技术的提高.....	(68)
二、明初民营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	(71)
三、明初的工匠制度和官营手工业的繁荣.....	(75)
四、明初商业的管理和商税制度.....	(86)
五、明初的交换媒介——铜钱和宝钞.....	(92)
六、明初汉族和西北、东北地区各少数民族 商业联系的加强——茶马贸易.....	(95)
七、明初的朝贡贸易与郑和下西洋.....	(103)

第二章 明中叶封建社会的衰落和 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正统元年至万历四十七年 1436—1619)

第一节 明中叶封建剥削的加强与流民的大量出现	(145)
一、政治的腐败黑暗与财政的挥霍无度	(145)
二、土地兼并的恶性发展及其后果	(148)
三、赋役制度的紊乱和繁苛以及地租剥削的加重	(152)
四、自耕农、佃农社会经济地位的恶化与 大量农民的逃亡	(156)
五、流民的出路与山区的开发	(161)
第二节 嘉隆年间财政经济的危机与张居正 的社会经济改革	(167)
一、赋役制度的败坏与财政的崩溃	(167)
二、张居正的社会经济改革	(173)
(一)澄清吏治和节约开支 (174) (二)清丈田亩与重绘鱼 鳞清册 (178) (三)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 (183) (四)整顿驿站和治理黄河 (189)	
第三节 明中叶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 萌芽的产生	(195)
一、明中叶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意义	(195)
(一)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状况 (195) (二)商品经济的 发展 (204) (三)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意义 (219)	
二、明中叶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及其特点	(227)
(一)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 (227) (二)明中叶资本主义 萌芽的产生 (228) (三)明中叶资本主义萌芽的特点 (233)	
三、万历年间市民反矿监税使的斗争	(235)

第三章 明末的社会危机和清初经济的恢复

(泰昌元年至康熙六十一年 1620—1722)

第一节 明末的社会危机和农民起义军的

社会经济政策	(257)
一、明末社会危机产生的原因与东林党人	
挽救危机的失败	(257)
(一) 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恶性发展与租佃关系的扩大 (257)	
(二) 赋役剥削的加重和“三饷”加派 (260)	(三) 地主阶级的没落和东林党人挽救社会危机的失败 (263)
二、明末社会危机的总爆发与明王朝的灭亡	(269)
(一) 财政危机, 政治瘫痪, 军队解体 (269)	(二) 城市衰败, 农村破产, 人民濒临绝境 (273)
(三) 农民起义与明王朝的灭亡 (276)	
三、农民起义军的社会经济政策	(278)
(一) “均田免粮”和土地、赋税政策 (278)	(二) “平买平卖”等工商业政策 (282)
第二节 满族入关前的社会经济形态与顺治建国	
时期的社会经济概况	(285)
一、满族入关前的社会经济形态	(285)
(一) 满族奴隶占有制的发展 (285)	(二) 满族社会封建化过程 (289)
二、顺治建国时期社会经济的调整和	
恢复社会经济的措施	(291)
(一) 圈地、“迁海”与社会经济的调整 (291)	(二) 恢复社会经济的措施 (301)
三、顺治建国时期的户口管理和土地、赋役制度	(310)
(一) 里甲和保甲制相辅而行 (310)	(二) 国家土地封建所有制及其经营形式 (312)
(三) 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土地私有制 (321)	(四) 赋役制度和“庚子奏销案” (324)
第三节 康熙时期经济政策的调整和	
社会经济的基本恢复	(329)
一、社会经济政策的调整	(330)
(一) 废除圈地令和实行“更名田” (330)	(二) 调整

垦荒政策和整治黄河（331）（三）改革田赋制度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336）（四）废除“迁海”令和推行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340）

二、社会经济的基本恢复……………（343）

第四章 雍乾时期的赋役改革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雍正元年至乾隆六十年 1723—1795）

第一节 雍乾时期的农业政策……………（373）

一、重申“重农务本”……………（373）

二、再次调整和落实垦荒政策……………（376）

三、农田水利工程的修建及其政策……………（383）

第二节 赋役制度的进一步改革……………（392）

一、摊丁入亩……………（392）

二、耗羨归公……………（400）

第三节 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405）

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农产品商品化水平的提高……………（405）

二、城市行会制度的发展和工商业的繁荣……………（415）

（一）城市行会制度的发展（415）（二）雍乾时期手工业生产的发展（420）（三）城市商业的繁荣及其特点（427）

三、对外贸易的发展……………（436）

（一）海禁时期的贡舶贸易（436）（二）“开海”时期

对外贸易的发展（439）

第四节 地租形态的演变和封建依附关系

进一步松弛……………（449）

一、三种租佃形式的递变……………（449）

二、押租制和永佃制……………（452）

三、货币地租的发展……………（457）

第五节 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461）

一、农村佃富农与经营地主较多地出现……………（461）

二、包买商的活跃与手工工场的发展.....	(468)
三、工匠的罢工与商民的罢市斗争.....	(473)
四、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缓的原因.....	(476)

第五章 嘉道时期社会经济衰退趋势的出现和 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入侵

(嘉庆元年至道光二十年 1796——1840)

第一节 嘉道时期社会经济衰退趋势的出现.....	(503)
一、土地兼并，农民流亡，农村经济日趋凋敝.....	(503)
二、封建统治者残酷的压迫剥削与 城乡手工业生产萎缩不前.....	(508)
三、吏治腐败，国家财政收入锐减.....	(510)
四、人口增长，耕地不足，人民生活贫困化.....	(512)
第二节 封建性的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的活跃.....	(517)
一、商业资本的畸形发展.....	(517)
二、高利贷的兴盛及其残酷性.....	(519)
三、山西票号的性质及其作用.....	(521)
第三节 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入侵和 罪恶的鸦片贸易.....	(525)
一、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侵略活动.....	(525)
二、清政府的闭关禁海政策.....	(528)
三、罪恶的鸦片贸易.....	(531)
后记.....	(540)

第一章

明初社会经济制度与社会 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洪武元年至宣德十年 1368—1435)

第一节 明初农村政策与农业生产 的恢复和发展

一 明初国内形势和农村政策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朱元璋领导元末农民起义，推翻了蒙元的统治，建立了大明王朝，改元洪武。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又对北部边境上的元顺帝残余的军事力量，以及其他国内分裂割据势力，进行了二十年的战争，终于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国家的统一，保证了边境的安全，使人民能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下从事生产，为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准备了条件。从整个历史发展来看，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意义。

明初，国内社会经济由于被蒙元统治者破坏得凋敝不堪，又经过元末二十多年的战争，人口减少，田地荒芜，成为农村的普遍现象。北方郡县，如济南“近城之地多荒芜”^[1]。中原地区，多是“草莽，人民稀少”^[2]。南方郡县，如常德府武陵等十县，“人民逃散，……土旷人稀，耕种者少，荒芜者多”^[3]。在这

种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仍旧在各地时起时伏地出现。其中著名的有：洪武初年，陕西沔县金刚奴“以佛法惑众”——组织起义^[4]；洪武十五年（1382年），广东农民起义，首领“号铲平王”^[5]；洪武十八年四川少数民族吴奎儿起义，号“称划平王”^[6]。类似的起义，在安徽、湖广、福建、浙江等行省也存在。这些起义是阶级矛盾的结果，是分散的、局部的反封建斗争。社会经济凋敝，说明明朝建立的经济基础十分脆弱。时起时伏的农民起义，显示着明朝的统治尚未巩固。

朱元璋面临国内社会经济的凋敝形势，如何改善旧的经济制度，以调整各阶级的关系，安定农村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使阶级矛盾不致扩大和激化，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便成为他施政的首要任务。

面对着元末腐朽统治所造成的紊乱社会局面，严重地影响农业生产的情况，朱元璋必须做恢复农村封建社会生产秩序的工作。

首先是编制户籍。他认为：“夫有户口而后田野辟。田野辟而后赋税增。”不控制劳动力，使之“得尽力田亩”，就谈不上“田野辟”^[7]，当然政权也就不能巩固。“邦本系于民数，版图防於生齿”^[8]，户籍编制便自然成为他最迫切的急务。

明代基本上承袭了元代的编户制度，以职业划分户别，把人民分为军、民、匠三大类，每类之下，又分为几个小类。如民户下又分为儒、医、阴阳等户；军户下又分为校尉、力士、弓兵、铺兵等户；匠户下又分为厨役、裁缝、马户、船户等。此外，还有盐灶、矿冶、僧道等户。为了使他们“毕以其业著籍”^[9]，朱元璋亲自抓户口编制工作：一是下令收集元代的“户口版籍”，洪武元年（1368年）下诏：“户口版籍应用典故文字，已令总兵官收拾，其或迷失散在军民之间者，许令官送纳”^[10]。二是下

令各人户籍，以原报元代的抄籍为定。洪武二年，朱元璋发布命令说：“凡是军、民、医、匠、阴阳诸色户，许各以原报抄籍为定，不许妄行变乱，违者治罪，仍从原籍”〔11〕。洪武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宣布普查户口，命令“户部制户籍户帖”〔12〕。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他不仅要户部官员主办此事，而且还派出军队到各地区去协助地方官员普查、核实户口和编制户籍户帖。洪武四年（1371年）发给直隶徽州府祁门县谢允宪和谢允护两户《户帖》各一份，其中谢允宪户的《户帖》格式和内容如下：

“户部，洪武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钦奉

圣旨：‘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户口不明白。

俚教中书省置下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帖，你每（们）户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着与那百姓一个户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来了。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做军。比到期间，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每（们）自躲避了的，一律要了罪过，拿来做军。’钦此。除钦遵外，今给半印勘合户帖，付本户收执者。

一户谢允宪系徽州府祁门县十（？）西都住民承

祖□户见当民差计家七（？）口

男子壹口

成丁壹口

本身年貳拾壹岁

不成丁□□

妇女壹口

妻阿□年壹拾陆岁

事产 田捌分伍厘肆毫

草屋一间 豢畜黄牛壹头
右户帖付谢允宪
洪武四年□月□日〔13〕

从保留下来的这两份《户帖》实物，知道徽州府祁门县在洪武四年已实行了户帖制度。当时实行户帖制度的地区，除上述徽州府祁门县以外，文献明确记载的，尚有常州府江阴县，明人李诩记述了洪武三年发给该县的《半印勘合户帖》的格式和内容^[14]。此外，还有苏州府，史称：“洪武三年，〔王〕智凯占籍〔苏州〕为民，越明年，户部家给一帖”^[15]。苏州府的户帖，民间称为“洪武安民帖”。明人许元溥记述了它的格式和内容^[16]。上述这些户帖的格式和内容，除个别字不同外，其余全部相同。从这些户帖中我们可以知道编制户籍户帖是分两个程序进行的，即先由户部定出格式，“合〔户〕籍与〔户〕帖，以字号编为勘合，识以部印”，颁发给各地官府，转发给人户填写；然后官府普查、核实，将户帖作为登记户口田产的证件，给原填写人户收执，户籍则作为登记户口田产的存根，由地方官府“岁计其户口之登耗，类为籍册”，上交户部收藏^[17]，以便日后互相核对。户籍和户帖的内容基本相同：一是载明一户的乡贯、丁口（成丁或不成丁）、姓名、性别、年岁；二是注明户别，即属民户或军户或匠户等；三是载明事产，如上述谢允宪户帖中列有本户“田捌分伍厘肆毫，草屋一间，孳畜黄牛一头。”所不同者，只是户籍没有也需要似户帖那样在开头记载朱元璋对户部官员说的那一段话。

在此以前，朱元璋曾亲自签发过一种称为“户由”的凭证^[18]，可惜文献记载过于简略，其内容今天还未能弄清楚。根据明人董谷说，明初苏州府也颁发过一种“户由”。他写道：“沈万三秀者，……赀巨万万，田产遍吴下，……国初每县分人

为五等，曰哥、曰畸、曰郎、曰官、曰秀，哥最下、秀最上。洪武初家给户由一纸，以此为第，而每等之中，又各有等，沈乃秀之三者也”〔19〕。这种“户由”是否就是户帖呢？因为当时苏州府已经施行户帖制度，如上所述。同时，明中叶以前，明人常把户籍凭证称为“户由”〔20〕。所以“户由”就是“户帖”的别称，是有可能的。如果是这样，苏州府颁发的户帖登记中，户别一项，又别户之等第，包括上述的户等户则，较之祁门县谢允宪等人的《户帖》具体详细些。

户帖制度从洪武三年十一月奉圣旨颁布，曾经雷厉风行地在全国各地施行，不仅派出军队在各地核实户口，而且还用严刑峻法来保证户籍户帖所登记的项目尽可能与人户的实际情况相符合。同时，“由于户帖所载不以纳税的人口为限，各户全体男女老少皆在登记范围之中，故与近代的所谓人口普查，最为接近。所以，西方的统计史学者也不能不承认明代的户帖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口普查记录”〔21〕。

其次，建立都图制度。“都图”是农村基层组织。史称：

“都图者，或云即都鄙，其鄙字旁有邑作图，盖古鄙字而俗仍读为图，或云取版图之义，非都鄙也。……〔元〕县各置隅，乡为都，里为图。……〔明〕隅都之名不易，各县隅或领图，图或仍为里”〔22〕。

都、图的得名，这条材料有两说：一说即都鄙，此说明人谢少连发明。他作《徽志》引《左传》“都鄙有章”一语，说此为都，图得名之由来，且说“鄙”字应该读作“鄙”。其实《左传》中的“都鄙”，前人注为“国都及边鄙”，即京都和边邑，和都图毫无关系，此说实穿凿不足信。二说取版图之义，据《嘉靖嘉定县志》称：“图即里也，不曰里而曰图者，以每里册籍，首列一图，故名曰图是矣”〔23〕。其说确凿可信。然都图之制，起于